学术专论

道学缘何成“伪”

——清圣祖的“伪道学”批判与康熙朝道学的政治境遇

于　磊

[摘要]　清圣祖远祧朱熹等宋儒的某种整全形象，近合中晚明以降通经博文的潮流，发挥出博约一贯论。借此，他得以既批判“伪道学”不够博观，鄙陋无文，又批判“伪道学”不够一贯，不务实践。“伪道学”批判使圣祖与前代以“伪学”禁朱熹等人者有异曲同工处；同时，一些道学士人也在政治斗争中产生宋代元祐党人碑、庆元党禁几复现于当世之感。而在对道学士人的边疑边用中，圣祖又渐趋向于否定道学士人的实践能力乃至道学本身的实践价值。在此条件下，为维系崇道尊朱形象，圣祖在将程朱等人视作绝对典范的前提下，将对程朱等人的批评表现为对“伪道学”背离典范的批评。

[关键词]　伪道学　博约一贯论　宋明理学　清圣祖
[中图分类号]　K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3）－04－0058－015

清圣祖崇道学、尊朱熹的形象常被人论及。① 而自清以来，常有人认为清帝崇道尊朱乃为统治实用，非因虔诚信仰。② 承此余绪，晚近研究或谓清朝尊儒重道，实重其统治术之用，③ 圣祖尊儒更是“权术”和“政治把戏”；④ 或谓圣祖身兼治统、道统以振君权，⑤ 其娴熟“操作”儒家符号不过因政治需要，⑥ 其帝王之学并非理学义理发明，实属统治经验和心得，更有反儒学性质。⑦ 此类视角固有其理，却因将清帝的意识形态建构理解为实用的“术”，难免轻忽作为“术”之依据的“学”或“道”。因此，近来学者常欲发掘圣祖等清帝的帝王经学或帝王之学。⑧ 然而，重

[收稿日期]　2022–04–12
[作者简介]　于磊（1997—　），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sevenandfive@ruc.edu.cn

① 如王锺翰：《康熙与理学》，《历史研究》1994 年第 3 期。相关研究参见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9–107 页；高翔：《在历史的深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66–274、321–372 页。
② 如朴趾源：《热河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年，第 218–220 页；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 年，“自序”第 1–4 页。
③ 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1–13、27–28、60 页。
④ 罗晓良：《康熙朝中叶文化政策与大一统政治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第 236 页。
⑤ 黄进兴：《清代政权意识形态之探究》，《优入圣域》，中华书局，2010 年，第 75–105 页。
⑥ 余英时：《序》，黄进兴：《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郝素玲、杨慧娟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1–7 页。
⑦ 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第 108、247 页。
⑧ 相关梳理参见孟尧、杨念群：《“治道关系”研究基本范式之反思》，《天津社会科学》2021 年第 4 期。

帝王之学又不免从客观上证成时人称颂圣祖的“体用兼该”“内圣外王”。[①] 前述“术”的视角常言清帝文教之问题，而清帝自立其道确又难免遇到困境。综合上述视角可探讨：圣祖之道是否有张力？圣祖如何因应之？道学在康熙朝政治境遇如何？

解读这些问题的关键应在圣祖批判“伪道学”，而这又集中表述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他就御制题目《理学真伪论》所作评论。圣祖或更直接批评“讲道学”者、“道学之人”，似有道学很难不“伪”之意，故圣祖的“伪道学”批判基本近乎道学批判。[②] 首先，圣祖早年据其对帝王之道的理解，以博约一贯论为分辨真伪道学的整全标准，其中既有如前人常关注的公忠诚敬、言行相符、不尚虚名、力行实践、能济实事，[③] 也有不应鄙陋无文之义。其次，前人多未深察分辨真伪的前代故事，未念及朱熹、东林都有过“伪学”或“假道学之名”的待遇。[④] 而在康熙二三十年，不仅圣祖大致应已意识到他与宋代伪学之禁有异曲同工处，道学士人也觉宋代奸党之碑、伪学之禁似重现。再次，既分辨真伪以至近乎道学之敌，批评道学士人乃至道学本身，如何谓圣祖崇道尊朱？为缓此张力，圣祖中晚年愈将朱熹等悬置为绝对典范，将对朱熹等的不满转化为批判“伪道学”，代道学先贤断言“伪道学”背离典范。

一、以博约一贯论批判“伪道学”

康熙三十三年《理学真伪论》一题出台前，圣祖批评庶吉士时实已批评“伪道学”：“伊等如此尚讲论道学，谓四六文章无关政治，可乎？伊等徒然口说而已，岂有真正道学之人？果有如宋儒言者，朕亦心服，然程朱何尝不作文字？”[⑤] 闰五月初四，圣祖试诸臣，亲命题《理学真伪论》。试毕，圣祖说：“从来理学须务实践，不尚虚名，如已故两江总督于成龙……方是真理学。若徒事空谈，实行不副，如何令人心服？”[⑥] 圣祖将力行实践、不尚虚名视作真道学标准，却又认为鄙薄文章的翰林不配讲论道学——务实践何必在乎虚辞文章？况在他看来，翰林官“以文章为职业”，“惟闭户读书，方称其职”，“不可干预他事”,[⑦] 怎能将所学所言付诸实践？则在圣祖心中，何为可指涉程朱一类所谓真道学的整全标准？这或许是其所谓博约一贯、万殊一本的“帝王之道”或“圣贤之业”：“帝王之道质文互用，而大化以成；圣贤之业博约并施，而性功以备。”[⑧] 此既能为其发掘正统道学外的学术世界辩护，也在客观上呼应了宋以降尤其是明清之际通经博文的学风。借此，圣祖得以批判他眼中的“伪道学”既非博观，也非约取。

（一）圣祖为何发掘正统道学外的学术世界

圣祖亲政后，熊赐履、张贞生、卫既齐等道学士人以正统道学进于圣祖。此所谓正统道学非与朱熹等人毫厘不差，而指更有卫道之风，既欲格君心之非，又会轻视道学其他流派和非道学者。就格君心言，道学士人屡以天下尚未太平，应少出巡等进谏圣祖。康熙七年，熊赐履上

① 徐乾学：《憺园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2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403、566 页。

② 姚念慈谓圣祖初尚抬宋儒以压今儒言行不符、无济实用，后隐然欲否定宋儒。见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第 227 页。参见潘志和：《〈理学真伪论〉直解》,《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17 年第 3 期。

③ 新近研究如辛晓霞：《政治对清初理学的投射》,《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20 年第 1 期。

④ 参见李超：《南宋宁宗朝前期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天启六年三月十九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实录》附录 3，1962 年，第 1341 页。

⑤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5 册，康熙三十三年三月十六日，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 年，第 2433–2434 页。

⑥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5 册，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初四日，第 2599−2604 页。

⑦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4 册，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十九日，第 1930 页；《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八月二十六日，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507、1529 页。

⑧ 玄烨：《御制文集》卷 19《古文渊鉴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91 册，第 276 页。

言“朝政积习未祛，国计隐忧可虑”。[1] 十年，卫既齐上言“今之天下有太平之象而无太平之实，皇上有更化之心而未得更化之道”，[2] 被圣祖称“这所奏无益”。张贞生九年上言请“罢无益之游”；他还曾谓“太平虽渐有象，不可无太平难保之虑”，[3] 请圣祖停十年出关谒陵。十年张贞生因进言“蒙恩止镌二级”，后南归。[4] 十一年，熊赐履又请圣祖“节巡游，慎起居，以塞天下之望”。[5]

就学问立场言，上述道学士人又不免对其他学问抱消极态度。在道学内部，熊赐履专守程朱，直斥陆王。康熙十二年，圣祖问熊赐履知行合一之说，熊赐履遂说：“知行合一乃后儒穿凿之论，毕竟有病。”[6] 张贞生虽曾“颇阐阳明良知之说”，但“后乃一宗考亭”，[7] 且不久便去职，难以深刻影响圣祖之学。道学之外，熊、张更以一般诗文为小技。十二年，熊赐履对圣祖说，六经为斯文之祖，一般文章“区区掞藻摛词，雕虫小技，奚足多乎”。[8] 至于张贞生，圣祖“命之曰经书”，“则陈说无余蕴”；“命之曰诗”，“则辞以小道不足为”。[9]

于政，圣祖不免以道学士人之言无益甚至掣肘；于学，圣祖又不免有道学士人学问褊狭的印象。故康熙十五年熊赐履因嚼签事革职，[10] 似成圣祖思想转变一关键点。因熊事，时人或谓“汉臣不足任，道学不足信”。[11] 李光地记述圣祖曾谓“羞不过”熊赐履，似即因嚼签；[12] 且圣祖又曾说熊赐履“自己错误不肯承认”。[13] 故圣祖视野或因熊氏去职而开阔，那些被熊氏等人压抑的他念更得以复苏，如虽被熊赐履等反对但仍被圣祖喜好的诗文和出巡。

在这些条件下，更可理解圣祖何以“好古右文”。[14] 就在熊赐履仍劝阻圣祖出巡的康熙十一年，徐乾学已用文学为圣祖出巡辩护。他认为“古者词赋之作，所以铺扬鸿业，咏歌盛治”，但司马相如、扬雄等的文章“于主德奚裨”？他谓圣祖出巡体现至孝：“我皇上奉事两宫……可与虞舜、姬文比烈矣”，“恐世儒不察，竟以上林、长杨之事相为比拟，殊失厥旨”。[15] 圣祖于此自会右文。十六年，圣祖令张英、高士奇入侍南书房，讲论文义，亦每令二人扈从出巡。[16] 进而，圣祖将文学植根于六经，[17] 又“以经学为治法”。[18] 是则不难理解他以《经史赋》试诸臣，并将后人视作“通经复古”，[19] 肇“乾、嘉学派之先声”[20] 的徐乾学置于第

---

① 《清圣祖实录》卷 27，康熙七年九月癸丑。

② 卫既齐：《廉立堂文集》卷 3《条陈用人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65 册，第 248 页。

③ 张贞生：《庸书》卷 2，《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82 册，第 162、171、182 页。

④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 5《张学士》，中华书局，1982 年，第 97 页。

⑤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一年四月初九日，第 30 页。

⑥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第 136 页。

⑦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 5《张学士》，第 97 页。

⑧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第 114–115 页。

⑨ 罗丽：《王山遗响序》，张贞生：《王山遗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55 册，齐鲁书社，1996 年，第 32 页。

⑩ 《清圣祖实录》卷 62，康熙十五年七月甲午。

⑪ 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九，中华书局，2016 年，第 208 页。

⑫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中华书局，1995 年，第 747 页。

⑬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4 册，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第 2197 页。

⑭ 徐乾学：《憺园文集》卷 35《御选古文渊鉴凡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24 册，第 710 页。

⑮ 徐乾学：《憺园文集》卷 1《温泉赋并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24 册，第 262 页。

⑯ 如《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日，第 331 页；《南书房记注》，《张英全书》下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343、369–371 页。

⑰ 玄烨：《御制文集》卷 19《古文渊鉴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91 册，第 275 页。此与前述熊赐履观点一致，但大体来说，熊赐履意在反对圣祖倾心文学，圣祖意在论证文学正当性。

⑱ 玄烨：《御制文集》卷 19《日讲易经解义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91 册，第 273 页。

⑲ 黄家鼎：《榕村语录续集序》，李光地：《榕村语录》，中华书局，1995 年，第 6 页。

⑳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 33《健庵学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067 页。

一。[①] 而朱彝尊曾向圣祖进《经义考》，圣祖谕“此书甚好”，赐“研经博物”匾额。[②] 后来，高宗更谓此书“实有裨于经学”。[③]

（二）博约一贯论呼应宋以降学术潜流

既见正统道学外的世界，圣祖为统合自身学问，又发挥博约一贯论。康熙十七年，他已言及“一本散为万殊，万殊归于一本，博约兼资之道”。[④] 此外，他更作《为学如炼金说》[⑤] 和《博约一贯论》[⑥] 表述此论的儒家经典依据，足见圣祖深重此论，所谓“由博而约，诚能反复研极，可以见性体之大，而识尽性参赞为一理”。[⑦] 圣祖虽认为徒习浩瀚载籍之“文辞”，“侈其浩博，而不深考其道法之大原，得诸心而致诸用”无益（故需约），[⑧] 但又论需博：“虽帝王之学不专事纂组章句，顾由博而约。往喆遗训，惟能网罗记载；搜讨艺文，斯足增长见闻，充益神智。”这便为圣祖自述的于六经、性理外博览史乘、文学、诸子百家等作辩护，即凡此非但无累，反而有裨“帝王之学”。[⑨] 除以博观约取、万殊一本作义理依据外，圣祖还特地以唐太宗为自己辩护。太宗“嗜兰亭帖，至竭万乘之力”，极易被视为无裨治道，但在圣祖看来，这毕竟无妨“贞观之风几与三代比隆”：“盖其纳谏受言，力行仁义，所图者大举，凡游艺之事不足以累之；况寄心翰墨于几务之余，岂非前王之令轨哉？”[⑩]

是则圣祖博约论妙在几可将万事容纳其中，以归一本（至于圣祖之一本内涵，亦可因事而异）。他更曾说“朕博览载籍，即道书、佛经无不记识”。[⑪] 他可以仁义为本，谓佛教“不外仁义以为教”，[⑫]“与劝善惩恶之道盖无殊旨”。[⑬] 故对御制五台山碑文，王鸿绪赞“虽言佛教，而儒家治平之理包括已尽”，汤斌赞“发挥象教而归本仁义”。[⑭]

既然圣祖推崇朱熹等宋儒的所谓整全形象，那么圣祖博约一贯、万殊一本之论与既有思想流别有何关系？[⑮]《孟子》已言“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⑯] 朱熹也将博观约取、文行兼备视作程学精当处：“程子之说……本于行事之实而不废文字之功……学者循是而用力焉，则既不务博而陷于支离，亦不径约而流于狂妄。”[⑰] 与“理一分殊”相关，《朱子语类》释“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章”更谓，应是万殊而非一本难认，要“就万殊上见得皆有恰好处”。[⑱] 然在当时，朱熹已觉程氏门人“虽曰祖其师说”，“恐其皆未足以及此”；[⑲] 至于后世士人，亦难达上述所谓全

---

① 徐乾学：《憺园文集》卷 1《经史赋并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24 册，第 266 页；韩菼：《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徐公乾学行状》，钱仪吉纂：《碑传集》卷 20，中华书局，1993 年，第 687 页。

② 张宗友：《朱彝尊年谱》，凤凰出版社，2014 年，第 509 页。

③ 《乾隆上谕》，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第 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1 页。

④ 《南书房记注》，《张英全书》下册，第 379 页。

⑤ 玄烨：《御制文集》卷 21《为学如炼金说》，《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91 册，第 289 页。

⑥ 玄烨：《御制文第二集》卷 30《博约一贯论》，《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92 册，第 357–358 页。

⑦ 玄烨：《御制文第二集》卷 40《书性理奥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92 册，第 489 页。

⑧ 玄烨：《御制文集》卷 20《乾清宫读书记》，《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91 册，第 278 页。

⑨ 玄烨：《御制文第二集》卷 40《庭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92 册，第 485–486 页。

⑩ 玄烨：《御制文集》卷 29《书兰亭帖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91 册，第 362 页。

⑪ 《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第 2228 页。

⑫ 玄烨：《御制文集》卷 23《北台灵应寺碑》，《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91 册，第 309 页。

⑬ 玄烨：《御制文第三集》卷 20《五灯全书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93 册，第 250 页。

⑭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第 1157 页。

⑮ 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 41–46、292–296 等页；邓国光：《康熙与乾隆的“皇极”汉、宋义的抉择及其实践》，彭林编：《清代经学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15–118 页。

⑯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92 页。

⑰ 朱熹：《大学或问下》，《朱子全书》第 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529–530 页。

⑱ 朱熹：《朱子语类》卷 27，《朱子全书》第 15 册，第 965、975、989 页。

⑲ 朱熹：《大学或问下》，《朱子全书》第 6 册，第 530 页。

然境界（此境界亦非全无问题）。中晚明以降，士人中渐起通经博文之风；① 明清之际，此脉中人仍或区分鄙陋无知的道学末流与朱熹这样的道学大家。若顾炎武强调“博学于文”，反对“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② 又谓“惟绝学首明于伊洛，而微言大阐于考亭”。③

而此学风之所以能为圣祖感知，顾炎武外甥徐乾学等人作用颇为重要。李光地不满徐乾学乃至南书房诸翰林之学，但从反面佐证乾学等对圣祖的影响：“至高澹人、徐健庵，专意破除道理、治道、经书，总是诗歌词赋不相干的话……使皇上谓：‘蛮子学问，不过如此而止。’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④ 这与通经博文之风紧密相关。徐乾学谓曾“闻娄东诸先生以经学倡起”，表示应文以载道、贯穿经史并以六经为文章根基。承尊经学风，他更谓“汉儒引经决狱最为近古”，“古人无不以经术为吏治”。与顾炎武等相似，徐乾学又以“一切抹摋理学之绪言”为“虚气浮响”。⑤ 故此与圣祖推崇朱熹等宋儒整全形象并无明显分歧。总之，圣祖似从称他为“体用兼该、质文并茂”⑥ 的徐乾学等身上，发现正统程朱道学外的学问。圣祖借此得以更好统御士人，特别是批判鄙陋无文的“伪道学”。

（三）既非博观、也非约取的“伪道学”

博约一贯、万殊一本，在逻辑上固然圆融。然而，逻辑圆融是一回事，现实冲突又是另一回事。一本虽有道学义理依据，但若容纳过多万殊（好诗文甚至赞佛教），亦不免所谓离经叛道。强调博还是约，端在圣祖一心运用之妙。在批判“伪道学”时，圣祖博约一贯论妙在以周程张朱为绝对典范，既可批“伪道学”不够约取，无法从纷争的门户间发掘一贯之理，力行以明诚敬之道，也可批“伪道学”不够博观，鄙陋无文。

一方面，圣祖批评“伪道学”的门户私见，不能力行大道，难达一贯之“诚”。康熙二十六年，圣祖对汤斌说：“朕常读朱子、王阳明等书，道理亦为深微，乃门人各是其师说，互为攻击。夫道体本虚，顾力行何如耳。攻击者私也，私岂道乎？” ⑦ 朱、王皆有理，囿于门户纷争，便难约取一贯之道。后圣祖屡就一本、约取相关层面论道，谓“性理诸书中亦不过辨别公私二字”，⑧“《性理》一书，千言万语，不外一敬（或诚）⑨ 字”，⑩ 实欲训谕臣子力行实践以明诚敬——言行相符方属诚敬；⑪ 反之则难逃“伪道学”指控。

另一方面，圣祖批评“伪道学”的“鄙陋无文”，⑫ 后者自乏博观万殊的功夫。被圣祖称作“博学明辨”⑬ 的徐乾学有时也难知圣祖用典出处，曾求助于阎若璩，阎氏一时也只说出大概，这已被徐氏赞为“博”。⑭ 可想见圣祖在群臣心中应已有某种博学形象。既然博闻多识的徐、阎都未必能回答出圣祖的问题，遑论圣祖鄙夷的“伪道学”。康熙二十四年，圣祖借谓周程张朱“文

---

①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 5、13 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11–123、294–314 页；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第 328–332 页；马子木：《重塑纪纲：东林与晚明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 年，第 235–258 页。

②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 3《与友人论学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第 40–41 页。

③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 5《华阴县朱子祠堂上梁文》，《顾亭林诗文集》，第 121 页。

④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第 776–777 页。

⑤ 徐乾学：《憺园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24 册，第 353、494、511、588 页。

⑥ 徐乾学：《憺园文集》卷 12《赐览御制文集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24 册，第 403 页。

⑦《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第 1641 页。

⑧《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22 册，康熙五十二年九月三十日，第 12413 页。

⑨《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11 册，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十六日，第 5845 页。

⑩《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 2465 页。

⑪ 如《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第 1089 页。

⑫《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1 册，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附阅通鉴论断语”，第 218–219 页。

⑬ 韩菼：《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徐公乾学行状》，《碑传集》卷 20，第 688 页。

⑭《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第 1159 页；张穆：《阎若璩年谱》，中华书局，1994 年，第 65–66 页。

质灿然”，批评崔蔚林：“至近世则空疏不学之人，借理学以自文其陋。如崔蔚林本无知识，文义荒谬，岸然自负为儒者，究其意解不出庸夫之见，真可鄙也。”① 二十六年，“德格勒所作，不成诗文”，圣祖又批评德格勒：“朕观学问浅陋者，大都假借道学之名。”② 二十八年，圣祖批评李光地：“古来道学如周、程、张、朱，何尝不能文？李光地等冒名道学，自谓通晓《易经》卦爻，而所作文字不堪殊甚，何以表率翰林？”③ 此外，张鹏翮、文志鲸、张伯行这些圣祖认为与道学或李光地有关者（见下），后都曾被圣祖问以道学、性理问题，又都难答之，这更会让圣祖觉得“伪道学”确实鄙陋、“读书人”实“不读书”。④

二、道学士人为何又成“奸党”“伪学”

圣祖评真伪道学，与宋代伪学之禁有异曲同工处。同时，一些道学士人也觉宋元祐“奸党”、庆元“伪学”之祸似重现（烈度自与前代有别）；而这既因道学士人或深或浅地参与了明珠、索额图、汉军于成龙（如未说明，下文“于成龙”皆系汉军而非汉人于成龙）的党争，也与捐纳争议颇有关系。自然，无圣祖分辨真伪道学和默许在前，这些都难以想象。

（一）圣祖分辨真伪暗合宋代批判道学者

圣祖要批判的“伪道学”，南宋时已被时人感知，只不过或一概视之为“道学”。学者常谈及周密引沈仲（子）固语，批评道学士人“伪学之党，甚于典午（司马）之清谈”：

> 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立身如温国（司马光），文章气节如坡仙（苏轼），亦非本色……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虽时君亦不得而辨之矣……言行了不相顾，卒皆不近人情之事。⑤

不济实用、学问鄙陋、党同伐异、言行不符，几圣祖所谓“伪道学”；且圣祖亦曾批评“伪道学”歧视司马光、⑥ 苏轼（见下）。这提示圣祖批评“伪道学”与宋代道学批判的潜在关联。

《起居注》载圣祖康熙二十四、二十五年所作论断，其中有：

> 上阅宋孝宗时陈贾请禁道学，论曰：宋之诸臣排击程朱，以伪道学斥之，固非正论；若涂饰言貌，袭取君子之名，其隐微践履实不可以告人者则又不可不辨。设以假窃之徒尽目之为道学，是宋室之与闻性天者更多于孔门也。⑦

即固不能以程朱为“伪道学”，但宋时确应分辨表里不符的“伪道学”。何为“宋之诸臣”所谓“伪道学”？此段又见《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该书“监察御史陈贾请禁道学”条谓：

> （陈贾）曰：“……邪正之辩，诚与伪而已矣。表里相副，是之谓诚；言行相违，是之谓伪……所谓道学者……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者邪？”……帝曰：“道学岂不美之名？正恐假托为奸，真伪相乱。”⑧

此应圣祖所本，则宋时所谓“伪道学”“真伪相乱”，“假其名以济其伪”，近乎圣祖之“伪道学”。圣祖未斥程朱为“伪道学”，但这不妨碍他将被认为是贴在程朱等身上的错误标签贴到他认定的“伪道学”身上。更有甚者，康熙朝道学亦遭近似宋朝“奸党”“伪学”之祸。

---

①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初二日，第 1313 页。
②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十三、十四日，第 1625–1626 页。
③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初七日，第 1870 页。
④ 《清代起居注册 · 康熙朝》第 22 册，康熙五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第 12399–12406 页；《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十二月初一日，第 2226、2228 页。
⑤ 《周密集》第 3 册《癸辛杂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157–158 页；《周密集》第 4 册《志雅堂杂钞》，第 40 页。
⑥ 如《清圣祖实录》卷 216，康熙四十三年六月丁酉。
⑦ 《清代起居注册 · 康熙朝》第 1 册，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附阅通鉴论断语”，第 163、230–231 页。
⑧ 玄烨：《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 16，康熙四十六年武英殿刻本，第 40 页。

（二）政治斗争中成“奸党”“伪学”的道学士人

（1）“奸党”李光地：于成龙捐纳政策下对道学士人的打击

康熙二十七年，明珠去位。后于成龙渐崛起，其捐纳政策为一批道学士人所反对。捐纳实近卖官鬻爵，既有败坏朝纲官风之虞，又壅塞正途进士晋升之路。① 时人大抵认为，于成龙起初官声甚好，在明珠去位后却渐失人望，原因之一应即其主捐纳。② 三十年，户部以征噶尔丹军用浩繁，请捐纳者免保举。“以理学闻于世”③ 的陆陇其疏请“速停保举之捐，永闭（捐纳）先用之例”等事。④ 应是在军需输运任务的压力下，同时也是在于成龙等持捐纳论者和捐纳利益相关者的促动下，九卿认为陆陇其“不计时之缓急、事之要否，专务虚名，有紊政事”，“应将陆陇其革职，发往奉天安插”。圣祖虽免治其罪，但也说他“懵愦不知事情，妄昧陈奏，甚属庸鄙”。⑤

在于成龙捐纳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道学”应已是于成龙意识到的反对力量，圣祖为实现相关目标亦或默许于成龙打压“道学”。议陆陇其罪时，有欲救陇其者，如卫既齐面奏，据说其谓“出巡所属地方，民情皇皇，惟恐陆御史远谪”。⑥而李光地曾荐陆陇其，⑦ 故圣祖命人问李光地陇其事，“似取口供者然”。陆陇其事后，捐纳复行。李光地谓当时于成龙炙手可热，独杜臻、彭孙遹与自己“不至其门投一刺”；于成龙议开捐纳时，亦独此三人（未必皆以道学闻名）不画题，以示反对。⑧《文贞公年谱》更载李光地斥捐纳“主议者”（应指于成龙）“亵越”国家名器。⑨ 故李光地谓于成龙为捐纳事仇之，且当圣祖问于成龙“捐纳可有人不喜否”时，于成龙谓“只讲道学者不喜”，“独道学说不便耳”。⑩

陆陇其之后，康熙三十一、三十二年间，卫既齐遭斥，更牵李光地入“奸党”。卫既齐是李光地会试时房官，⑪ 光地谓十一年卫既齐便“给假去”，及三藩平才出补。既如前述所奏无益，又不于国难时公忠体国，本就不满于三藩之变中汉人动向的圣祖不会无动于衷。⑫ 而李光地曾向圣祖荐卫既齐，⑬ 并对圣祖说卫既齐、陆陇其“留心性命之学”；⑭ 卫既齐又曾申救李光地所荐陆陇其，则卫氏似已被圣祖视为李光地一党。

圣祖虽曾称赞卫既齐“所行甚佳”，⑮ 但不久就表示对卫既齐不满。顺天府府尹缺出，卫既齐等举部远平。圣祖道：“卫既齐道学之人，乃将此行事乖乱者举出，岂不有累道学之名乎？”不

---

① 捐纳相关研究参见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明清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173 页；刘凤云：《权力运行的轨迹》，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 年，第 50–99 页（于成龙参见该书第 108–144、214–260 页）；周远廉：《清朝兴亡史》第 3 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 年，第 437–466 页。

②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第 743–744 页；《两江总督傅拉塔奏报众人议论情形折》，康熙三十三年三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57–58 页。

③ 陈廷敬：《监察御史陆君墓志铭》，《碑传集》卷 16，第 491 页。

④ 陆陇其：《陆陇其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269–270、272–273 页；《清史列传》卷 8《陆陇其》，中华书局，1987 年，第 524–526 页。

⑤《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2 册，康熙三十年六月十七、二十二日，第 797–799、804–805 页。

⑥ 吴光西等：《陆陇其年谱》，中华书局，1993 年，第 187、327 页。

⑦ 柯崇朴：《四川道监察御史陆先生陇其行状》，《碑传集》卷 16，第 483、485 页。

⑧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第 682、686、759–760 页。

⑨ 李清植等：《文贞公年谱》，《榕村全书》第 10 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46 页。

⑩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第 723–724、744 页。

⑪《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五年十月初四日，第 1545 页。

⑫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第 762–763 页。参见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第 28–36 页。

⑬ 李清馥等：《榕村谱录合考》，《榕村全书》第 10 册，第 179 页。

⑭ 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康熙二十九年九月十九，第 272 页。

⑮《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初九日，第 1726 页；《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2 册，康熙三十年二月初三日，第 624 页。

久，圣祖又直指卫氏为“假道学”。[①] 康熙三十一年，卫既齐在贵州巡抚任上被认为“启衅边疆，不察虚实，遽行发兵，杀戮无辜苗民，又谎奏大败苗子叛兵”。[②] 圣祖将卫既齐与“真道学”（汉人）于成龙相比，实嘲讽卫氏无自负之“大才”。又谓卫既齐“平时但务虚名，自居道学，及验之行事，总无实效”，“言行全不相符”，“欺朕之人若不正法”，“则何以儆后之欺世盗名者”；“即因此致人议论，朕亦听之不畏也”。卫既齐岂敢再说“皇上有更化之心而未得更化之道”，他只得说“从前年少无知，曾经狂妄渎奏”，“罪之当死”。[③] 既然圣祖说正法，九卿便议斩卫既齐。不过圣祖先说“尔等所议甚是”，后又从宽免其死，令发往黑龙江。[④] 李光地谓其牵入卫、陆事，圣祖便说“蛮子那有一个好人”，“入奸党籍”后成其自我认知：“卫老师流黑龙江，又牵予入奸党籍矣。上问北门（明珠）曰：‘卫某发遣，道学亦怕否？’亦不言道学为谁。”[⑤]

不过，伴随康熙三十三年前后于成龙捐纳政策陷入困境，道学士人似迎来一丝曙光。三十一年，陕西饥馑，捐纳为清廷所行赈济法之一。但川陕总督佛伦奏，“仅有数而实无此数银两”。圣祖朱批：“于成龙承办此事，未必妥当。”[⑥] 及三十三年正月，圣祖在众臣面前批评于成龙捐纳政策。《起居注》载圣祖质问于成龙：“汝谓捐纳无累百姓否？”《榕村续语录》则作“汝对朕说，捐纳人皆说便，独道学说不便耳”。圣祖一面追究于成龙“所奏捐纳事，亦止徇人情面”，户部尚书王骘前往陕西赈济，“不过为于成龙取些实收来”，“不过为人捐纳耳，曾救得饥民几人？”另一面又问李光地等意见。李光地谓捐纳：“军兴时，是权宜，应开的。太平时，似不宜。”按理说李光地奏对应合上意，但李光地却说：“上亦不怿……可见于（成龙）之短予于上前也。”不久，圣祖以李光地“学问平常，然为人亦非苟且者”，使其提督顺天等处学政。李光地便谓此命乃因于成龙，但“得此以占清流中”。[⑦]

（2）“伪学”熊赐履：明珠、索额图党争下的“庆元党禁”

与入“奸党”的李光地类似，与李光地不和的熊赐履兄弟（可见道学士人非铁板一块），[⑧] 也遭“伪道学”之祸。康熙三十一年任吏部尚书的熊赐履，[⑨] 任上见当时捐纳成风（“上堂争缺，沸如市井”），“动多牵制，即整顿甚难”，不得“澄叙流品”，恐将来自己不免“尸素之愆”。[⑩] 前述三十三年圣祖面斥于成龙捐纳政策，熊赐履便道“臣等……因见陕西频年荒旱，拯救饥民甚急，再四陈请为此一时权宜之计”，此或其所谓“尸素之愆”。而熊赐履似又被圣祖视为袒护于成龙一党。面斥于成龙时，圣祖已说若究问吏部左侍郎布颜图，则“请行捐纳，皆各有意中之人，欲其录用升转之故耳”之类事“皆毕露”。[⑪] 三月，两江总督傅拉塔又奏布颜图与于成龙交结。[⑫]

---

①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2 册，康熙三十年闰七月初四、二十日，第 844–846、863 页。

②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4 册，康熙三十二年三月初二日，第 1868–1869 页。

③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3 册，康熙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十二月十五日，第 1507、1736 页；第 4 册，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第 1862–1864 页。

④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3 册，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1737–1738 页；第 4 册，康熙三十二年三月初二日，第 1868–1869 页。

⑤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第 730 页。

⑥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3 册，康熙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第 1383 页；《川陕总督佛伦奏报捐纳银两数目不实折》，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33–34 页。

⑦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5 册，康熙三十三年正月十八、二十六日，第 2282–2304、2334 页；李光地：《榕村续语录》，第 723、744 页。

⑧ 如李清馥等：《榕村谱录合考》，《榕村全书》第 10 册，第 232–233 页。

⑨ 《清圣祖实录》卷 157，康熙三十一年十月癸巳。

⑩ 熊赐履：《澡修堂集》卷 9《答孙座主》，《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39 册，第 359 页。

⑪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5 册，康熙三十三年正月十八日，第 2288–2289、2293–2294 页。

⑫ 《两江总督傅拉塔奏报众人议论情形折》，康熙三十三年三月十七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57–58 页。

后布颜图被保举，圣祖不悦，问谁举之，经查便有熊赐履以布颜图“贤能保举”。①

此时熊赐履正值多事之秋。康熙三十三年，圣祖以《理学真伪论》考试群臣，并批评应考的熊赐履之弟赐瓒“应抬之字竟不抬写，不应用之语辄行妄用”；又批评熊赐履所作《学统》，谓“道学之人又如此务虚名而事干渎乎”。数日后，众臣奏熊赐瓒“应即正法示众”，赐履应一并议处，圣祖从宽免予处分。②

康熙三十四年，熊赐履又觉元祐党人碑、庆元党禁似重现。是年二月，圣祖问熊赐瓒捐纳事（御史龚翔麟谓“赐瓒包揽捐纳”），赐瓒“奏对欺饰，上烦宸谴”（赐履语），后下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既然熊赐履已几被圣祖视作“伪道学”，臣下亦会以“伪道学”视之。三月，龚翔麟参熊赐履“伪窃讲学虚名”（或作“伪学欺罔”，龚氏次年又参熊氏“窃道学虚名”）。③ 此次遭劾后，熊赐履遵旨回奏，自认“本鲜识知”，“绝无实行，轻肆空谭”，“谫陋无比”，此合圣祖空谈、鄙陋的两层“伪道学”标准；但他又谓不敢“举念涉欺”，似未自认是十足“伪道学”。④ 私下里，他或否认自己是“伪学”：“伪学者仍托于学，特不真耳。仆固无学，即何论伪借？”或引“伪道学”自嘲：“吾道固自不孤也。仆虽不肖，便做伪道学，何伤耶？”⑤

上述回奏后，圣祖置龚疏不行。熊赐履遂赋诗颂圣，一方面将龚翔麟及其背后势力视作欲兴宋代绍圣（同文馆狱）、崇宁（端礼门元祐党人碑）和庆元旧事（“伪学”与弹劾朱熹）的小人，另一方面又感慨圣德昭明，小人之意竟不行：

> 伪学名色本难当，多少英豪下福堂。不是圣明弛厉禁，也须骈首就桁杨。
>
> 晦翁罪状草谁成？曲笔诬人天亦倾。莫道赀郎不识字，居然搦管效胡纮。
>
> 同文狱内词多屈，端礼门前事更奇。寄语安民休抱憾，而今不立党人碑！⑥

朱熹被劾“伪学”而落职，上表念宋宁宗“尧仁广覆，舜哲周知”，自称“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⑦私下里亦只能说“以伪学获罪圣朝，杜门龉舌”以避祸。⑧是则熊赐履赞“圣明弛厉禁”亦无足怪。不过他既说“英豪”难当“伪学”，则难免腹诽此前圣祖批“伪道学”。

此“伪学”风波之所以让熊赐履联想到庆元党禁，亦很可能因此系明珠势力对反明珠势力的打击，至少熊赐履有类似感知。熊赐履同情与明珠有隙、且被龚翔麟弹劾的赵良栋，⑨ 昭梿直谓龚翔麟乃明珠党人，⑩ 亦是旁证。康熙三十四年二月，熊赐履道熊赐瓒下狱事：“闻某君嗾某用前代厂卫毒手多方罗织，以兴大狱，其意总在于仆。赖满司寇力持之，其势稍减。”⑪ 此时“满司寇”为图纳，⑫ 李光地称图纳与徐乾学交好，又称徐乾学曾为起复熊赐履访明珠未果，后便连结索额图。⑬ 三十三年，圣祖令荐“长于文章、学问超卓者”，熊赐履等荐徐乾学、韩菼等人；但

---

①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5 册，康熙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三十日，第 2689–2691、2700 页。

②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5 册，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初七、初十日，第 2610–2621、2627–2631 页。

③ 顾栋高：《御史龚公翔麟传》，《碑传集》卷 55，第 1577 页；《清史列传》卷 7《熊赐履》，第 505 页；熊赐履：《澡修堂集》卷 15，《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39 册，第 384 页。

④ 熊赐履：《澡修堂集》卷 1《遵旨回奏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39 册，第 304–305 页。

⑤ 熊赐履：《澡修堂集》卷 9、10，《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39 册，第 359、362 页。

⑥ 熊赐履：《澡修堂集》卷 15，《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39 册，第 384–385 页。

⑦ 李心传：《道命录》卷 7 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73–74 页。

⑧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 7《答俞寿翁》，《朱子全书》第 25 册，第 4778 页。

⑨ 熊赐履：《澡修堂集》卷 6《跋赵将军回奏疏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39 册，第 343 页；《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6 册，康熙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七月初四日，第 3292–3294、3309–3310 页。

⑩ 昭梿：《啸亭杂录》卷 9《赵勇略》，中华书局，1980 年，第 306 页。

⑪ 熊赐履：《澡修堂集》卷 9《复友人》，《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39 册，第 359 页。

⑫ 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86–190 页。

⑬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第 725–726、740、746–747 页。

徐乾学未被起用已身故，其弟秉义等起用。[1] 熊赐履似成徐乾学在朝故旧（如图纳）之一环。圣祖也曾说熊赐履“后与明珠为难”，“问可用人，索（额图）必以熊对，熊必以索对。”[2] 故熊氏似仍袭徐乾学亲索远明之路。约被劾“伪学”前后，熊氏致信韩菼、徐秉义，似恐他们被明珠势力追究：“两贤阅后，仍掷还，或即碎之，恐见之者又为谭柄也。”[3]

虽然道学士人获“奸党”“伪学”之名，但是若政治环境变化，如捐纳等道学士人反对的政策必要性消减时，圣祖崇道尊朱的大旗便会高扬。

三、质疑道学如何维系尊朱形象

康熙五十一年，圣祖升朱熹于孔庙十哲之次。[4] 五十年时还认定世祖、圣祖皆肯定王守仁的毛奇龄，[5] 据说闻此遂斧其驳朱的《四书改错》之板。[6] 此事应昭示了士人心中圣祖尊朱形象的彻底奠定。多年前，许三礼条奏朱熹等从祀位次，圣祖谓“无关国计民生”，“不过欲沽虚名”。[7] 则此次升位何关国计民生？五十二年六月，[8] 圣祖《朱子全书序》谓尊朱实为宣示以先王之道怀柔天下，又谓：“予少时颇好读书，只以广博华赡为事，刚勇武备为用。自康熙三十五年天山告警，朕亲擐甲胄……后有所悟，而自问兵可穷乎，武可黩乎……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9] 圣祖在此反思早年博观、万殊学问之弊，更强调约取、一本朱熹之学。有学者认为，此所谓平准噶尔战后尊朱未必符实，因至康熙四十年以后，圣祖仍重诗文，[10] 至死都“敬书”佛经。[11] 此固有理，本文所论重点则在：首先，平准之役仍是圣祖重道学的重要节点，此后为休养生息，圣祖所用疆臣中颇有道学士人的身影；但圣祖对他们仍用中存疑，以致从否定后者的实践能力上升到否定道学的实践价值。其次，不论赞佛等事，圣祖也不免疑程朱，但仍将其视作绝对典范，并代先贤断言自己不满者为背离典范的“伪道学”，以维系自身崇道尊朱形象。

（一）平准战后圣祖对道学疆臣用中存疑

康熙三十五年征噶尔丹，圣祖谓：“若于成龙运米不误，则噶尔丹何能脱逃？”进而斥于成龙所主捐纳“无济于军务”，“欲市恩沽誉于众”，又谓：“用捐纳之人，必至苛派小民，扰害地方，断不能为清廉好官……熊赐履自负读书之人，何亦不议及此？”按圣祖表述，每开捐纳，皆诸臣执意请开，圣祖勉从公议，“朕不知九卿必欲行捐纳何意”。[12] 但熊赐履“自负读书”，怎能与于成龙同流合污？圣祖虽对捐纳态度摇摆，但对支持捐纳的道学士人又不无失望。[13] 故前述三十三年方斥于成龙，圣祖便想起他曾称作“甚属庸鄙”的陆陇其：“学问优长，操守亦且甚

---

①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5 册，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初二、初四、初五、二十一日，第 2716、2723–2724、2727–2728、2757 页；第 6 册，康熙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第 2827 页。

②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第 750 页。

③ 熊赐履：《澡修堂集》卷 9《与元少彦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39 册，第 359 页。

④ 参见赵刚：《权宜之计：康熙五十一年朱熹升配孔庙十哲之次的政治史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1 期。

⑤ 毛奇龄：《王文成传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87 册，第 12、19–20 页。

⑥ 全祖望：《萧山毛检讨（奇龄）别传》，《鲒埼亭文集选注》，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 286 页。

⑦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第 1523–1524 页。

⑧ 玄烨：《御制朱子全书序》，《渊鉴斋御纂朱子全书》，康熙五十三年武英殿本，第 14a 页。

⑨ 玄烨：《御制文第四集》卷 21《朱子全书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94 册，第 242–245 页。

⑩ 参见成积春：《走向盛世的政治思维：康熙治道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年，第 19–74 页。

⑪ 罗晓良：《康熙朝中叶文化政策与大一统政治之研究》，第 234–236 页。

⑫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10 册，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第 5739 页。

⑬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8 册，康熙三十五年九月十八日，第 4513–4515 页。

善，前曾条奏一事，朕至今犹念之。”①

圣祖此次批评于成龙捐纳政策，又将有何改作？《朱子全书序》已谓不可穷兵黩武，《榕村续语录》亦谓圣祖向李光地述平准战后“庶可言‘休养生息’四字”。②康熙三十六年，圣祖更明白宣示休养生息的政策取向：“今噶尔丹已平，天下无事，惟以吏治民生为要务……朕恨贪污之吏更甚于噶尔丹。此后图修吏治民事如图平噶尔丹，则善矣。”既恨贪污之吏，则滋生腐败的捐纳也需修正。同期，圣祖再次批评捐纳：“今正途出身进士升用甚少，捐纳官员甚多，大有害于地方……张鹏翮所食不过腐菜，费用甚简，故居官甚清。”③于此，圣祖又透露出任用与道学相关者治理地方的意向（张鹏翮与道学关系见后）。

其实，圣祖基本认为道学士人不济实事，故谓之“伪道学”。前述卫既齐如此，遑论他认为巡抚苏州的道学士人汤斌等，“似此徒有虚名者，无济实事”。④故圣祖对道学疆臣也用中存疑。康熙三十七年，圣祖任李光地为直隶巡抚。⑤三十八年，李光地参吴禄礼、济兰，圣祖说光地“素行褊浅”，“挟仇题参”。但数月后，圣祖又赞光地“居官最优，操守清廉”，“即旗人兵丁无不称颂”，“善乘马，仿佛满洲”。⑥

如此，圣祖对道学疆臣实边疑边用，故并未彻底抛却对“伪道学”不济实事等方面的批评。康熙四十年，圣祖说：“李光地朕初尚不以为意，自授巡抚以来居官甚佳，但所参多系汉军，不知人才实不分汉军、汉人。”⑦四十三年，圣祖叹“李光地近日声名较前稍减，彼每被人欺诳”；“张鹏翮向有清名”，“但被属员王谦等欺诳耳”。⑧此叹前数月，圣祖更有一对道学的普遍描述：

> 古今讲道学者甚多，而尤好非议人，彼亦仅能言之耳，而言行相符者盖寡……又人见讲道学之人，或不见用，辄为太息，以为彼果见用，必有可观，此亦徒见其空言而云然也，若果见用，言行亦未必相符。⑨

“见讲道学之人，或不见用，辄为太息”，似应针对当时李光地、张鹏翮等遭斥。

李光地在直抚任上，曾举杨名时、赵申乔、文志鲸等，而后杨名时督顺天学政，赵申乔为浙江布政使，文志鲸督浙江学政。《文贞公年谱》载李光地属吏（疑为朝琦）“阴结禁密，散为流言，指摘公所荐杨名时、文志鲸等以撼公”。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李光地迎驾，圣祖因故怒，后遂解杨名时督学任，降文志鲸为知州；⑩更斥“李光地尚可信乎”。⑪四十三、四十四年，圣祖又评李光地“凡人口讲道学彼即深信之”，“听信杨名时虚饰道学之言，往往误事”，“夫道学岂易言哉”。⑫故光地叹杨、赵、文受“谤议”：“如今最苦，是朝廷用一清洁自好不要钱人，便群起而谤议之，造为蜚语……都是无影话，可恨！可恨！”⑬

同期受到圣祖批评的还有河道总督张鹏翮。本来，圣祖用张鹏翮等人应有挽捐纳之弊的用

①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5册，康熙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第2318–2319页。

②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第859页。

③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10册，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十九、二十三日，第5739–5740、5746–5747页。

④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13册，康熙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第7152页。

⑤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12册，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第6737页。

⑥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13册，康熙三十八年七月十七日，第7273页；第14册，康熙三十八年十二月初五、初十日，第7616、7637页；李清植等：《文贞公年谱》，《榕村全书》第10册，第53–54页。

⑦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16册，康熙四十年十月初九日，第8915页。

⑧ 《清圣祖实录》卷218，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壬戌。

⑨ 《清圣祖实录》卷216，康熙四十三年六月丁酉。

⑩ 李清植等：《文贞公年谱》，《榕村全书》第10册，第61–62、66–68页；朝琦见李光地：《榕村续语录》，第767、833页。

⑪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18册，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第10414页。

⑫ 《清圣祖实录》卷216、219，康熙四十三年四月戊寅、四十四年三月壬子。

⑬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第823页。文中谓赵申乔到湖南“今幸而一年”；赵氏四十一年十二月被命调湖南（《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17册，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第9773页），故此言约在四十二、三年间。

意，之后却曾发现此前条奏“开例捐纳，则举人、进士俱致壅滞，不得升转”的张鹏翮竟说可为修河工开捐纳。[①] 四十四年圣祖批评张鹏翮：“尔自谓居官清廉，一介不取……取与不取，惟尔自知之……尔乃讲道学之人，道学以无私为本，内有私则外行尽属虚饰。”张鹏翮有“清名”，圣祖则似要在群臣面前大白其虚饰之处：“尔平时亦讲理学，乃一味苛刻严厉，岂所谓光风霁月乎……若徒饮食菲薄，自表廉洁，于国事何益耶？”[②] 那如何才能有益国事？五十年，圣祖谓其曾谕张鹏翮“但遵朕训谕修筑，倘有差误，朕不卸责于汝”，“张鹏翮后俱照朕指授修筑，故今河工底绩”，“虽系汉人，为人尚坚实”。温达回奏：“凡事遵行圣训，务必有成。若不遵行圣训，无有不差误者矣。”[③] 是则“伪道学”无用，钦遵圣谕方济实事。

至此，从汤斌、卫既齐到李光地、张鹏翮，道学疆臣难济实事应成圣祖心中固定认知，后张伯行巡抚江苏亦加深圣祖此感。康熙五十三年，圣祖闻张伯行“怕海贼杀他”，“刺客害我”，[④] 故嘲笑“平日亦讲理学”[⑤] 的无用书生张伯行：“每日编性理之书，性理倘有应杀伊之理，应于自身寻之。倘事不胜任，无一人可信，身为节钺大员，如此小气，性理安在……书生可笑。”[⑥] 五十四年圣祖又谓张伯行曾奏“惟期风移俗易，家给人足”，乃“风俗未见移易”，“民食维艰”，则张伯行不啻“无其实而出大言，以欺世盗名”。[⑦]

（二）圣祖否定道学实践价值

圣祖既认为真道学在务实践，又怀疑甚至否定道学士人的实践能力（就本文所举各例言行不符乃至“品且不端”[⑧] 而言，还否定了道学士人的道德），潜藏着对道学实践价值本身的否定。此为圣祖务实践之真道学论的内在矛盾。换言之，何止“伪道学”，道学本身似很难不“伪”。

圣祖对道学实践意义的否定充分体现在社仓上。[⑨] 康熙四十二年，圣祖认为“应于各村庄设立社仓收贮米石”。此外，他曾以社仓事面谕李光地“酌量举行三年”，并欲以直隶为社仓试点。[⑩] 原定社仓试行三年，然因试行不顺，屡次展限。及五十三年，所捐杂粮不过一万五千七百余石，时任直隶巡抚赵弘燮更觉“民情鲜于乐输”。[⑪] 至此，社仓在圣祖心中已近乎道学士人空谈。五十五年，张伯行奏于直隶等地建立社仓。圣祖认为“建立社仓，殊无裨益”，故虽许其试行，但仍不以此事为可行：“社仓之法虽美，断不可行。朕……曾以朱子社仓问魏廷珍、王兰生，皆以为朱子复生，乃始可行。直隶之人，未有不以行社仓为不便者。”圣祖早便认可“有治人，无治法”之论，但亦认为“真能办事的也难多得”，[⑫] 故社仓法虽善，非朱熹不能行。而圣祖

---

①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13 册，康熙三十八年五月初四日，第 7132 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 219、220，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壬子、四月壬辰。
③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19 册，康熙五十年六月二十三日，第 10845–10847 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5 册，档案出版社，1985 年，第 699–704 页。
⑤ 《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第 2166 页。
⑥ 《两江总督赫寿奏闻秋审定于苏州举行折》，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954–955 页。
⑦ 《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四年二月初一日，第 2146–2147 页。
⑧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16 册，康熙四十年十月十五日，第 8939 页。
⑨ 社仓相关研究参见陈支平:《朱熹的社仓设计及其流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萧公权:《中国乡村》，张皓、张升译，九州出版社，2018 年，第 181–185 页。
⑩ 雍正《大清会典》卷 39《蠲恤五》；李光地:《榕村全集》卷 27《覆社仓疏》（康熙四十三年三月初四日），《榕村全书》第 9 册，第 139–140 页。
⑪ 《直隶巡抚赵弘燮奏报所属报捐社仓米谷情形折》，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十八日，《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 册，档案出版社，1984 年，第 804–806 页；《直隶巡抚赵弘燮奏请展限设立新仓折》，康熙五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3 册，档案出版社，1985 年，第 486–488 页；《直隶巡抚赵弘燮奏请奖励绅民捐输社仓粮食折》，康熙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5 册，第 823–827 页。
⑫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二年三月初三日、二十七年三月初九日，第 85、1747 页。

眼中空谈道学的张伯行，果然不到一年便称“永平地方设立社仓断不能行”。[①] 六十年，圣祖便下定论：“设立社仓原属良法，但从前李光地、张伯行曾经举行，终无成效。”[②] 数月后，李光地曾举荐过的朱轼，[③] 似要为李光地正名，请于山西“建立社仓，以备荒歉”。圣祖便向朱轼述及李光地、张伯行试行社仓如何无益，甚至使民有怨言，并谓：“社仓之设，始于朱子，其言具载文集。此法仅可行于小邑乡村，若奏为定例，属于官吏施行，于民无益。”此语近乎认为朱熹社仓之法不具普遍意义。既如此，朱轼也只好自称“一时冒昧陈言，今细加筹划，实属难行”，请免令试行。但不知圣祖是乐观其成还是乐观其不成，他仍让朱轼留在山西，“鼓励试行”。[④]

既然有治人无治法，讲道学者又不能如朱熹（遑论朱熹亦非无问题）可济实事，则道学理想虽高远，亦难付诸实践。由此，圣祖虽认为务实践为真道学，但又否定道学实践意义。这时，他早年便信奉的“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便更具影响力。[⑤] 相应地，他信奉“率由旧章，即为善耳”。如他康熙五十四年斥赵申乔“不遵成宪，任意而行，断乎不可”，“今若有人向朕奏，旧时所理之事不合，当改，朕亦断然不改也”。[⑥]

在此谨遵成宪的状态下，道学士人如李光地的理想自难实践。其政治构想大致是：“如今不能复三代，只复得汉也就大好。兵民不分，文武不分，官俸厚而设官少，大官权重而小吏多……（如今）只是根本大纲领说不起。”康熙四十四年，李光地曾面奏圣祖腹里参用民兵、边海经制之兵屯田以省费，以所省兵费厚官俸以养廉。《文贞公年谱》载：“上皆然之，而重慎改作，未及施行。”《榕村续语录》载圣祖赞复民兵，但恐做不成为人笑。李光地也赞成“要得人”，否则“无成而有害”。[⑦]

圣祖和李光地都认可“有治人”更重要，区别在认为是否有其人。圣祖以为讲道学者非其人。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大学士李光地请假回籍。九月，曾被李光地推荐的左都御史刘谦因（纵容家人）殴打御史，被圣祖斥责“讲道学之人，如此行事，可乎”。十一月，曾被李光地推荐的湖南巡抚陈瑸请禁加火耗，圣祖谓陈瑸不过“欲自表其清”，“博身后虚名”。[⑧] 五十五年五月圣祖言“李光地、赵申乔之党”势大，“汉大臣欺压满大臣，八旗皆受辱”，[⑨] 则上述事例很可能是趁李光地离京整顿他眼中的李党和“伪道学”。五十六年，圣祖更明言道学士人无用：

> 讲道学之人，家中危坐，但可闲谈作文，一有职任，即有所不能。若不用此辈，又以不用士人为怨，朕何必令人怨耶？即如汤斌、耿介与赵申乔辈，朕皆用至大臣。刘谦平日亦讲道学，一至大位，即有事故。[⑩]

而李光地则说，若“自己不济”，“转见得人都不如我，动叹天下无人”；“岂无人哉？不能用耳”。[⑪] 这或在间接批评圣祖自己不济，不能用人。

（三）代道学先贤断言以维系尊朱形象

圣祖否定“伪道学”实践能力未必有错，但“道学”与“伪道学”是否有楚河汉界？圣祖

---

① 《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十二日，五十六年四月十三日、七月二十七日，第 2321、2381、2419 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 292，康熙六十年四月己酉。

③ 李清植等：《文贞公年谱》，《榕村全书》第 10 册，第 87 页。

④ 《清圣祖实录》卷 294，康熙六十年九月丙申、癸丑。

⑤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第 68 页。

⑥ 《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第 2174 页。

⑦ 李清植等：《文贞公年谱》，《榕村全书》第 10 册，第 70–72 页；李光地：《榕村续语录》，第 839–840 页。

⑧ 《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初八日、九月二十五日、十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初八、初九日，第 2191、2200、2207、2215、2217 页。刘谦、陈瑸被李光地举荐事见李清植等：《文贞公年谱》，《榕村全书》第 10 册，第 82、89、100 页。

⑨ 《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初二日，第 2280 页。

⑩ 《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初六日，第 2408 页。

⑪ 李光地：《榕村语录》，第 480 页。

大概已意识到二者区别并非分明，故其在批评“伪道学”时，亦常用“讲道学者”之类指称批评对象，则“讲道学”与“伪道学”常不过一间之隔。既然“讲道学”都很可能归入贬义词，那么应如何评价道学先贤？事实上，圣祖亦不免批评程朱等人。朱熹等人未必无可被质疑之处，但圣祖对他们的批评又被掩盖在尊朱大旗下，更彰显其内心的紧张。为缓解这种紧张，即便间接批评朱熹，圣祖也视之为绝对典范，并代道学先贤断言，将朱熹需被批判之处归诸后来“伪道学”对其的背离，以致这种批评不免“朱冠李戴”。

康熙三十年，圣祖提到《性理大全》“所载朱熹辈之言”：“字都被苏、黄胡乱写坏了。”汉大学士以为“朱熹辈与苏轼辈各自为党，故非之如此”。圣祖遂说：“苏轼、黄庭坚文章书法，后人至今仿效，由此观之，其非之之意无乃偏甚。”“偏甚”似批评朱熹。圣祖或认为此言不妥，在诉诸文字时又回护朱熹：“观其墨迹，亦尝间有苏、黄笔意。考亭之论或出于其门人所附会，未可知尔。”⑫ 这又将“偏甚”归诸朱熹门人之附会。又如，圣祖谓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庶几《春秋》大居正之宗指”，但又说“其间事例檃括，稍有脱误”，不过“大都门人一时采辑之过，实非晦庵本意也”。⑬ 又将朱熹文本之误，归于朱熹门人。

圣祖常会克制对朱熹的质疑，回护朱熹。康熙四十三年，圣祖说：“君子先行后言，果如周程张朱勉行道学之实者自当见诸议论，若但以空言而讲道学断乎不可。朱子洵称大儒，非泛言道学者可比拟也。”⑭ 为何朱熹“非泛言道学者可比拟”？圣祖很可能已意识到朱熹与后世“伪道学”的连续性，但他毕竟不敢直言朱熹之非。他只得将朱熹等人作为绝对典范悬置于神堂，于朱熹言论中取其所需，将其所不需者视为背离朱熹的“伪道学”。

至于朱熹以外的道学士人，更未必有朱熹的待遇。《御纂性理精义·凡例》谓蔡沈范数之作“实非朱子之意”，乃“僭经之事”。⑮ 康熙五十四年，圣祖更说：“宋儒之洛党、蜀党，朱子亦深以为非。”⑯ 或许圣祖真信“字都被苏、黄胡乱写坏”是朱熹门人附会，着力强调朱熹并不党同偏私。无论如何，程颐作为洛党应已被圣祖训斥。五十六年，圣祖更质疑一道学目标：“程子云：人不学为圣人，皆自弃也。此语亦属太过。”⑰

四、余论

在早年圣祖看来，道学士人于学未免褊狭，于政未免掣肘，遂在徐乾学等影响下发掘正统道学外的世界。他进而远祧朱熹等宋儒的某种整全形象，近合中晚明以降通经博文的潮流，发挥博约一贯、万殊一本之义，试图表明自己即便游览经学、诗文乃至佛教，也能归本道学。圣祖借此批判“伪道学”既不够博观，鄙陋无文，又不够一贯，不务实践。在康熙二三十年，圣祖分辨真伪道学，进而批判“伪道学”的做法，与朱熹所遭伪学之禁发生某种关联；一些道学士人也会在政争中产生元祐党人碑、庆元党禁几复现之感。

伴随平准战后对吏治民生的强调，疆臣中颇有道学士人的身影。在对道学士人的边疑边用中，圣祖日渐否定道学士人的实践能力，甚至否定道学本身的实践意义（如社仓），则其标

---

⑫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2 册，康熙三十年十月二十三日，第 1026–1027 页；玄烨：《御制文第二集》卷 40《跋朱子墨迹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92 册，第 492 页。晚年更加标榜尊朱的圣祖，则更对朱熹所谓苏轼作文偏粉饰表示赞同，见《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21 册，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十三日，第 11653 页。

⑬ 玄烨：《御制文第三集》卷 21《资治通鉴纲目全书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93 册，第 256–257 页。

⑭ 《清圣祖实录》卷 216，康熙四十三年六月丁酉。

⑮ 《御纂性理精义·凡例》，康熙五十四年武英殿本，第 3a 页。

⑯ 《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第2167页。朱熹批评洛蜀党争中的苏轼见《朱子语类》卷130,《朱子全书》第 18 册，第 4050–4052 页。

⑰ 《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 2465 页。

榜的务实践之真道学几仅余空壳。圣祖既斥道学，又高调尊朱，内在逻辑自有张力。为缓此张力以维系崇道尊朱形象，他大抵将对朱熹等的不满转化为批判“伪道学”，即以朱熹为绝对典范的真道学，将不合己意者视作“伪道学”对朱熹典范的背离。

圣祖曾观世祖成法，① 尊道学的面孔似也掩盖了他对世祖“广览”群书、颇好佛教的继承；② 而他的“伪道学”批判近乎道学批判，更开世宗、高宗先声。如圣祖曾评杨名时“虚饰道学”，世宗则进而揭露杨名时之“假道学”。③ 高宗则走得更远：④ 一方面，他发扬圣祖对博观学问的好尚（如前《经义考》事），经学兴于其治下亦非偶然；另一方面，他虽曾辨理学之“诚”“伪”，⑤ 但后来便不再像祖父那般作此区分，而是把祖父批判道学的隐义揭示无遗——谓周程张朱少“致君泽民之实迹”，其讲学又会导向亡国。⑥ 清帝批评道学未必无理据，但亦不免偏颇尖刻之处。至于后来挽救社稷的曾国藩竟宗奉道学，自又非圣祖、高宗所能预料。

References

Yang Nianqun. *“Tianming” ruhe zhuanyi* (How the Mandate of Heaven transferred).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22.

Yao Nianci. *Kangxi shengshi yu diwang xinshu* (Kangxi’s prosperity and Imperial mind). Beijing: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shudian, 2018.

Zhu Weizheng. *Zhongguo jingxueshi shijiang* (Ten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s).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2002.

Why *Daoxue* Became “Pseudo *Daoxue*”: Kangxi Emperor’s Criticism of “Pseudo *Daoxue*”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Daoxue* in the Kangxi Period

YU Lei (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evenandfive@ruc.edu.cn)

Abstract: Based on a holistic image of Neo-Confucianists, including Zhu Xi, that conformed to the trend of philology since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Emperor Kangxi elaborated the theory of “from diversity to unity” (博约一贯论). Therefore, he could criticize “pseudo *Daoxue*” (伪道学) not only for its lack of diverse knowledge, but also for its failure to practic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which means one should match word to deed. By this criticism, we can associate the prohibition of “Pseudo School” (伪学之禁) with Zhu Xi in the Song Dynasty. Similarly, *Daoxue* scholars in the Kangxi period also experienced political struggles like those in the Song Yuanyou and Qingyuan periods. In addition, in questioning and using *Daoxue* officials, Emperor Kangxi gradually denied *Daoxue* scholars’ practical ability and even the practical value of *Daoxue* itself. To maintain his image of worshipping Zhu Xi and *Daoxue*, Emperor Kangxi regarded Zhu Xi and some other Neo-Confucianists as absolute models, and then criticized “Pseudo *Daoxue*” for their deviations from those absolute models.

Keywords: Pseudo *Daoxue*, from Diversity to Unity, Neo-Confucianism, Emperor Kangxi

---

①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18 册，康熙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第 10059 页。

② 真朴编次：《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 3《奏对别记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0 册，第 486–491 页。

③ 参见郭成康：《清代政治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第 548–550 页。

④ 参见夏长朴：《乾隆皇帝与汉宋之学》，彭林编：《清代经学与文化》，第 156–192 页；夏长朴：《〈四库全书总目〉对宋学的观察与批评》，彭林主编：《中国经学》第 20 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65–98 页。

⑤ 《清高宗实录》卷 128，乾隆五年十月己酉。

⑥ 弘历：《御制文二集》卷 18《题东林列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30 册，第 396 页。